



清代管学文献研究

QINGDAI GUANXUE
WENXIAN YANJIU

郝继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管学文献研究

QINGDAIGUANXUE
WENXIANYANJIU

郝继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管学文献研究 / 郝继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161 - 4746 - 7

I. ①清… II. ①郝… III. ①《管子》—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26.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631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蓝垂华 全太顺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18 千字
定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艺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重大项目孵化工程

联合资助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清代《管子》研究述略	(14)
第一节 清代《管子》研究之背景	(14)
第二节 清代《管子》研究之成绩	(35)
第三节 清代《管子》研究之内容	(51)
第四节 清代《管子》研究之影响	(70)
第二章 乾嘉学人与《管子》研究	(84)
第一节 乾嘉学人《管子》研究概述	(84)
第二节 王念孙与《管子》研究	(99)
第三节 俞樾与《管子》研究	(123)
第四节 孙诒让与《管子》研究	(144)
第三章 清代《管子》研究之杰出者——戴望	(160)
第一节 戴望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160)
第二节 戴望《管子》研究之内容	(171)
第三节 戴望《管子》研究之特色与影响	(192)
第四章 清代《管子》分篇研究	(208)
第一节 清代《管子》分篇研究概述	(208)
第二节 清代《弟子职》研究(上)	(219)

第三节	清代《弟子职》研究(下)	(233)
第四节	清代《地员》篇研究	(246)
第五章	清代《管子》义理研究	(262)
第一节	清代《管子》义理研究概述	(262)
第二节	方苞与《管子》义理研究	(269)
第三节	洪颐煊与《管子》义理研究	(279)
第四节	梁启超与《管子》义理研究	(288)
结语	(304)
参考文献	(306)

绪 论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国的霸业。《管子》一书是研究管仲最好的资料，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地位，主要原因和汉武帝之后儒术独尊有关，也与《管子》一书的散佚、残缺和被疑为“伪书”有关。明末清初，随着诸子学的复苏，《管子》研究开始显现出一些活跃的空气，以考据学派为首的一批学者在《管子》文字、训诂、校勘等方面的功绩甚伟。迄至晚清，国家内忧外患，始有一些接受西学之学者认真研究《管子》，寻绎《管子》的义理，试图找到富国强兵之道，客观上开辟了《管子》研究的新局面。

一 《管子》成书及版本简介

《管子》一书大约形成于战国中晚期，是管仲及其弟子和学派门人等共同完成的，由于成于众手，其内容显示出庞杂而深浅不一的特点。^①最初只在学派门人中流传，以后传播开来，由于后代门人所掌握的《管子》抄本不尽相同，所以《管子》一书至晚在西汉末年以前无论内容还是载体都是不同的。西汉后期，刘向毕其功，在他主持大型古籍整理活动中，完成了对《管子》的整理，并形成了后世流传较广的八十六篇本。据严可均记载，刘向整理之后到先唐这一段时期，《管子》的内容出现了散佚

^① 关于《管子》成书，历来说法不一，本书取较为通行的一说。

现象，约十一篇。^① 新、旧《唐书》记录了两个版本的《管子》，一个是题为管夷吾撰的十八卷本，一个是题为国子博士尹知章注的十九卷本。^② 二本的相差应是章节合并与分立的原因，不应该是散佚的缘故。到宋代，始有通行于后世的二十四卷本。明万历十年（1582），赵用贤集前人之大成，始成《管韩合刻》本，^③ 此后诸家校点注释《管子》所用底本多出于此。清代《管子》的版刻较少，侧重于校勘，较有影响的是戴望的《管子校正》，综合了前代的成果。^④ 近现代《管子》的版本以郭沫若等的《管子集校》为最优，^⑤ 汇集了历代数十家的校释成果，成为绝代之作。此后，赵守正的《管子注译》^⑥ 和谢浩范、朱迎平的《管子全译》^⑦ 在版本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今天，中华书局所出“新编诸子集成”丛书之《管子》，以南宋本为底本，用刘绩本作参校，为目前较为精审的版本。^⑧

二 《管子》研究综述

（一）古代《管子》研究概况

不难想象，在早期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形态下，《管子》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解释与研究的过程。先是管仲对自己的思想主张和宣讲，接着其追随者便开始他们的记录、说解与阐释工作，形成文字后纳入《管子》一书中，所以才造成了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同内容和形态的《管子》。直至西汉刘向校书之后，定本的《管子》出现，后人的研究才有了相对完整而稳定的依据。东汉班固的《汉书》因袭了刘向的校书成果，

① 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 页。

② 分别见于刘昉《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031 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531 页。

③ 与《韩非子》合刻，共四十四卷，赵用贤自刻，后附刘绩补注，九行十九字，小字双行，行字同，白口，四周单边，有刻工。

④ 初刊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后中华书局和上海书店曾多次影印。

⑤ 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⑥ 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⑦ 谢浩范、朱迎平：《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⑧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特别是将刘向的《别录》等目录成果保存下来，形成该书的《艺文志》部分。《汉志》对《管子》的记录出现在道家类，并记作“筥子”，“筥”与“管”为异体字。^①另外，在孝经类中又有《弟子职》一篇，据应劭所注，也为《管子》书中的一篇。《后汉书》中也有引用《管子》中的文字。以上我们可以认为是对《管子》研究的初始阶段。直到唐代，尹知章的《管子注》才真正上升到了对《管子》作详细注释与研究的层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尹知章是真正研究《管子》的第一人。此后杜佑的《管氏指略》（已佚）、明代刘绩的《管子补注》^②、朱长春的《管子榘》^③、梅士享的《诠叙管子成书》^④成为清朝以前研究《管子》的成就突出者。

有清一代，学术风气较浓厚，《管子》的研究也盛况空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的特点：（1）文字考订工作突出。清代在小学方面成就显著，以乾嘉学派为主的一些学者对《管子》的文字多所考订，如王念孙的《管子杂志》、俞樾的《管子评议》、孙诒让的《管子札迻》等。（2）思想义理的研究成就显著。对《管子》思想的解释与研究，如方苞的《删定管子》、戴望的《管子校正》、洪颐煊的《管子义证》、王绍兰的《管子说》、《管子地员篇注》等，这些著作除了注重词语的考证之外，还对《管子》义理的解释有独到之处。另据《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拾遗》^⑤以及《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⑥等的记载，清代研究过《管子》的先后约70人，如张佩纶、任兆麟、宋翔凤、周悦让、宋枏、许玉琢、杨深秀等。（3）分篇研究成为《管子》研究的一大亮点。在《管子》的研究过程中，清代学者注重于对《弟子职》和《地员篇》的研究，如洪亮吉的《弟子职笺识》、任文田的《弟子职集注》、庄述祖的《弟子职集解》、王绍兰的《管子地员篇注》等。（4）深受清代学者的影响，外国学者对《管子》的研究也已出现。主要是日本的学者，如猪饲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9页。

② 见清《四库全书》子部法家类下。

③ 明万历四十年（1612）张维枢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见子部第970册。

④ 明天启五年（1625）刻本，《四库存目丛书》影印，见子部第36册。

⑤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⑥ 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

彦博、安井衡等。

(二) 近现代《管子》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管子》研究工作主要是延续了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之风，在文字考订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贡献。如章炳麟、刘师培、于省吾、罗根泽、石一参、陶鸿庆、尹桐阳、庞树典等人。尤其是于省吾的《诸子新证》，参照了大量的出土文献，开诸子研究的新风气，同样也预示着《管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除了考据之学外，这一时期的《管子》断代及义理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就，如颜昌晓、屈雄、姜忠奎、李皓、姚步唐、黄汉、郭垣、梁启超、戴浚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管子》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理念的改革家和学者们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管子》的研究更进了一步。如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三人合著的《管子集校》（1956）、夏纬英的《管子地员篇校释》（1963）、马非百的《管子轻重篇新诠》（1979）等。

从改革开放一直到20世纪末，是《管子》研究的繁荣昌盛时期，《管子》的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学者们对《管子》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如经济理论、哲学思想、伦理学说、法律思想、教育思想、政治学说、军事外交学说等，对《管子》在各个领域表现的解读进入了一个深入细致的阶段。尤其是《管子》思想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在经济思想方面，有巫宝三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989）、陈永叹的《管子——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1999）、张友直的《管子货币思想考释》（2002）、周俊敏的《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2003）等；在法律思想方面，有焦传生的《〈管子〉法律思想初探》（1987）、吕华侨的《管子思想初探——以法律思想为主》（2003）、瓦永乾的《〈管子〉的法律思想研究》（2007）等；在军事思想方面，有袁德金的《管子军事思想初探》（1988）、黄朴民的《管子的军事思想体系》（1996）、战化军的《管子“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的军事谋略》（1997）、时晓红的《简论管仲的军事思想原则》（2000）等。除了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之外，《管子》的单篇研究也成就不菲，如杨柳桥的《〈管子·兵法〉新探》（1983）、赵守正的《〈管子·弟子职〉的注释与今译》（1986）、马非百的《〈管子·内业〉篇之精神学说及

其他》(1988)、周乾淙的《〈管子·侈靡〉真意的探索》(1990)等。另外,将《管子》和其他诸子甚至是国外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如张作民的《孔子、墨子、〈管子〉消费观念之比较》(1992)、谷玉梅和李德恩的《管仲与梭伦法治观同一论》(1998)、袁林的《管子、商鞅两大学派经济政策比较研究》(2007)等。再者,在这个时期内,有两件事使《管子》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件事是80年代后期召开的两个《管子》研究方面的研讨会(一个是1986年10月召开的首届《管子》学术讨论会;一个是1989年召开的“《管子》与齐文化”国际研讨会),这两个会不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管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对20世纪以来《管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可以说这两次盛会是对《管子》研究阶段性的总结,又是对20世纪末和21世纪《管子》研究的展望。另一件事是1987年一本专门性的研究刊物——《管子学刊》的诞生,这为《管子》的研究者充分、自由地抒写自己的思想打造了一个平台。

21世纪的头五年,《管子》的研究表现出强劲的势头,据不完全统计,在《管子》研究方面公开发表的论文、学术会议论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等约计290篇,出版的专著有胡家聪的《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任继亮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轻重论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乐爱国的《管子的科技思想》(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汤孝纯的《新译管子读本(上、下)》(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池万兴的《管子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20余部。这一时期,除了《管子》的分篇和分类研究还很盛行之外,利用出土文献和《管子》进行对勘比较研究的成果崭露头角,如马王堆的帛书、银雀山的汉简和敦煌出土的史料都有和《管子》文献相似之处,通过对两者的比勘,也得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郭丽的《〈管子〉文献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三) 国外对《管子》的研究

约和清朝同时期,日本的学者就开始对《管子》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猪饲彦博、安井衡等人。此后,日本对《管子》的研究没有间断过,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日本有关《管子》研究的论文就有20余篇,出现了一大批研究

《管子》的学者，如小林升、穗积文雄、木村英一、武内义雄、重泽俊郎、町田三郎、清水浩、神谷正男、原宗子、金谷治、柴田继雄等，他们的研究注重考证，如对《管子》的《轻重》、《九败》、《幼官》、《弟子职》、《水地》、《地员》等的考释有一定的见地。^①

除了日本对《管子》的研究之外，欧美的一些学者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作。19世纪末期，以格鲁勃（Wilhelm Grube）和冯·德·加布兰兹（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为开端，主要是对《管子》进行了翻译和描述的工作。此后，西方学者对《管子》的研究进入一个低潮，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真正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法国的汉学家亨利·马斯波罗（Henri Maspero）的《古代中国》、瑞士学者伯恩哈德·卡尔格伦（Bernhard Karlgren）的《中国古代书籍的可信性》、英国学者皮特·梵·德·龙（Piet van der Loon）的《论〈管子〉的传播》、德国汉学家古斯塔夫·哈洛恩（Gustav Haloun）的《弟子职，早期儒家片断Ⅱ》和《法家片断，第Ⅰ部分：管子55及有关原文》。另外，美国学者李克在《管子》的研究上用力甚勤，曾师从许维遹教授，并陆续出版了《〈管子〉：早期中国思想的一个宝库》（香港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管子〉——早期中国政治、经济和哲学论，一种研究与翻译》第一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② 他的研究成果对欧美《管子》的研究影响较大，并得到了西方学者相当高的评价。

三 当下《管子》研究的热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召开的两个《管子》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总结了80年代以来《管子》研究的成果，预告了《管子》研究新时代的到来，为后来的《管子》研究指明了方向。确实，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诞生了，并大有超迈前代之势。对20世纪

^① 见索介然《日本有关〈管子〉研究的部分论文》，《管子学刊》1988年第3期，第89—90页。

^② 以上一部分见李克《管子研究在西方》，《管子学刊》1989年第3期，第73—75、72页；另一部分见冯禹《欧美国国家有关〈管子〉研究的主要论著》，《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第11、93—95页。

和 21 世纪的前几年《管子》研究进行回顾，我们可以大略知道当下《管子》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管子》的作者和年代

虽然说《管子》的作者和年代是一个老问题，从《管子》产生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困惑着当代的《管子》研究者。学者从多角度、多方位对《管子》的作者及年代进行了考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了一些新的证据，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关于《管子》的作者，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1）认为大部分为管仲自著，以关锋、林聿时的《管仲遗著考》（1963）为代表，他们论证《管子》的《经言》、《外言》等部分为管仲所作。接着，李学勤的《〈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1992）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论证《轻重》亦为管仲一系所为。之后，李曦的《〈版法〉为管仲所作考》（1995）又从内容、文体等方面考证《版法》也是管仲所著。（2）认为《管子》是一部稷下丛书，以顾颉刚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1979）为代表，他认为管仲是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去著书，《管子》应当是战国到汉初的稷下学者著作的汇编。张舜徽也发表了《管子四篇疏证》（1982）一文来赞同此观点。（3）认为《管子》是管仲学派集体著成，以余敦康的《论管仲学派》（1980）为发端，他认为《管子》的大部分思想材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这一学派主要是由战国时期直至刘向编订《管子》之前崇尚和主张管仲思想的齐人组成的。接着，胡家聪的《管子原本考》（1982）、孙以楷的《稷下学宫考述》（1984）、杨向奎和张岱年的《灿烂的齐国文化》（2000）、宣兆奇的《管子三论》（2002）等都大略阐发了类似的观点。（4）认为《管子》是“家学”所造就，以罗根泽的《管子探源》（1931）为代表。后来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1992）亦赞同此观点，吕氏认为，“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亡佚即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

某集者，大不相同。”^①

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与对作者的研究一样难以论证清楚。多数学者认为《管子》非出自一人一时，应成于众手。虽然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和管仲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到每一篇章是什么人所写，学者们却又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将《管子》的篇章和同时代的《老子》、《国语》等文献进行比较，对其中的用字用语及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有人认为《水地》篇产生于《老子》之前，而《内业》等四篇形成于《老子》之后；^②有人认为《小匡》篇的内容晚于《齐语》（李学勤，1987）；有人认为《轻重》各篇为西汉时的作品（马非百，1956）；等等。这些学者的论证为《管子》断代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打下了基础，《管子》的断代仍是一个不甚了了的难题，对它的考证乃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学者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关于《管子》的思想

对《管子》思想的探讨一直都是《管子》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此方面的研究是最深入最全面的。总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哲学思想

《管子》是先秦诸子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哲学思想自然是后学研究的重点，又由于《管子》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极为复杂，故见仁见智，各成其说。有的学者认为《管子》的主体属于道家，其发展主流是黄老之学。^③有的学者认为《管子》中的《水地》是对水是万物本原思想的详细论证，^④《心术》等篇关于精气说的论述成为我国古代唯物论主要形态气一元论的理论基础。^⑤又有学者将《管子》中的“天道”与《老子》中的“道”和《荀子》中的“天行有常”进行了比较，认为三者存在同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② 见盖光、于孔宝《〈管子〉学术讨论会概述》，《管子学刊》1987年第1期，第88页。

③ 陈鼓应：《〈管子〉形势、宙合、枢言、水地诸篇的黄老思想》，《汉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6页。

④ 李云峰：《试论〈管子·水地〉中水本原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60—62页。

⑤ 乐爱国：《〈管子〉的精气说与气功学》，《厦门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52—55、62页。

异关系，显示出从西周神学天命论向后来朴素唯物主义天道观过渡的历史趋势。^①有的学者从认识论出发，认为《管子》总的基调是朴素的反映论和辩证思维方法，其理论框架是道家思想与阴阳五行思想融合的产物，主要表现在法天象地的思维意象、感而后应的反映理论、按实定名的认识标准、与变随化的认知方法及注意调查研究的行为准则等方面。^②

2. 经济思想

《管子》一书中对经济问题的阐述占很大的篇幅，很多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把经济思想的分析作为研究的重点。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考察，有些学者从宏观上解析了《管子》的经济理论，认为其建立了以“富国安民”为核心的生产、消费、分配、控制、租税等全面的经济框架。更多学者从微观入手，分析了《管子》在某一具体领域的思想理论，如农本思想、商业思想、经济管理思想、教育经济思想、消费思想、经济控制理论、经济伦理思想、货币理论等。

3. 政治思想

学者们普遍认为，《管子》中以“经言”诸篇^③、《心术》等为主的言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农本与民本合一、政治与经济合一、加强中央集权、选贤任能、礼法并举、富国强兵、王天下等。学者们不仅仅停留在《管子》思想的宏观性讨论上，而且走入《管子》的内里，深入探讨了《管子》某一方面的政治理论，如治国方略、治国之道、廉政思想、国家管理思想、用人之道、吏治措施等。

4. 法律思想

《管子》十分强调法治，重视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管子》“法”的目的重在安天下而不是“变法”，主张法治但不离

① 张连伟：《〈管子〉与〈荀子〉思想之比较》，《管子学刊》2001年第4期，第11—16页。

② 转引自盖光、于孔宝《管子学术讨论会概述》，《管子学刊》1987年第1期，第89页。

③ 《管子》七十六篇，分为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7篇、短语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4篇、管子轻重16篇。

礼、俗、德教。^①他们认真研究了《管子》中“法”的特质，认为“法”具有公开性、平等性、强制性、稳定性、时宜性的特点。也有学者认为，《管子》的法律管理思想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春秋时期管仲的法律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军法入行政和确立司法长官的职责及当时相应的长官人选等内容；二是战国时期管仲学派的法律管理思想，主要有尚法的特性、立法原则、行法程度等内容。^②

5. 军事思想

《管子》有富国强兵、军事训练、赏罚分明的治军思想，此外，又加入了“明于机数”、“遍知天下”、“释坚而攻虚”、“无方胜之几”等具体的军事指导思想，是继《孙子》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有的人则详细地论述了兵技巧学在《管子》中的体现，认为在《管子》中除了更多关注战争中人是主体因素外，还涉及了战争中所使用的器物。^③也有人从经济学入手，谈论《管子》中的军事经济思想，认为《管子》从“举兵”的经济得失出发，主张要审慎对待战争；从当时的国力出发，主张富兵于农，耕战合一；从制胜敌人的根本目的出发，主张发展生产，改善政治，取信于民。^④

6. 教育思想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逐渐重视对《管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有人从教育的前提、方法、作用和分科教育思想等方面对《管子》进行了探究，认为《管子》的教育思想中，突出以地方为单位，因风俗人情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强调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指出教育的前提是经济基础，只有解决了民生问题，才能有更好的教育。^⑤有人从大教育观、德育、四民分业、弟子四个方面对《管子》的教育思想进行评价，认为《管子》的教育思想集各家之大成，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接受性，

① 王强：《〈管子〉法制思想析论》，《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第30—34页。

② 官芳：《论〈管子〉的法律管理思想》，《管子学刊》2008年第1期，第8—12页。

③ 张颂之：《试论〈管子〉兵技巧学》，《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第16—20页。

④ 江墨林：《〈管子〉的军事经济思想》，《军事经济研究》1990年第4期，第51、83—84页。

⑤ 曹培培：《〈管子〉的教育思想研究》，《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2—33页。

同时具有创新与互补的特色。^①

（三）关于《管子》和其他文献的比较研究

《管子》的内容博大而庞杂，廓清其内容的时代和来源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其中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将其与同时代的或后期的文献加以比较。在这一方面，现代学者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探讨：一是将其与传世文献作对比，如管子与范蠡、管子与桑弘羊、管子与淮南子、管子与晏子、管子与司马迁、管子与孔孟、管子与墨子、管子与庄子、管子与老子等。二是将其与出土文献相比较，与《管子》密切相关的出土文献主要有：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与《春秋事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鲍叔牙》等。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王兵》篇与《管子》书中《七法》、《地图》、《参患》等篇文字相似。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与《管子》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势》、《九守》等篇关系密切。《春秋事语》中第七章《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第十六章《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与《管子·大匡》中相关记载文字接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鲍叔牙》中的《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竞建内之》与《管子》的《霸形》、《戒》等篇可以互证。通过和这些文献的互证，学者可以对《管子》一些篇章的年代、语言等问题有更为明确的认识。^②

（四）关于《管子》的分篇研究

从清代开始，对《管子》的分篇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主要是基于《管子》并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书而且思想流派较为复杂的认识而产生的。要想理清《管子》的内容及思想，就不得不分章分篇地逐一进行研究。在这一方面，今人在清代学术的影响下，展开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讨。对《管子》分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侈靡》、《地员》、《内业》、《轻

^① 何金钱、李锡平：《〈管子〉教育思想浅析》，《管子学刊》2008年第1期，第26—28页。

^② 关于《管子》与出土文献对比研究，郭丽的《〈管子〉文献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可参考。